

國父逝世四十六週年

孫亞夫

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六十週年，舉國朝野在熱烈的慶祝，盼望着建國後第二個辛亥為新機運的開始年。在歡欣鼓舞之餘，國人回顧過去，飲水思源，就要先行紀念。中山先生的偉功。若無先生的首倡，和大無畏的精神，赤手空拳掀起了革命的浪潮，則帝制變為民國，勢將遲緩數十年。本月十二日，適逢先生辭世四十六週年，吾儕既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民，就應誠篤地歌頌先生的大德大功！歌頌不僅是一篇文字，一場演講，或是一次紀念會，而要從性天中發出一種行為，篤踐創國者的精神，使中華民國步入復興之路。

一種思想經了相當時期的闡揚和孕育，終必成熟而發生一種行為。先生經十七年的奮鬥，國人受了號召而爆發出革命的火花，輕而易舉的建立了中華民國。革命黨人集合南京，成立臨時政府，一致推舉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。袁世凱別具野心，在清廷與革命黨間故弄手段，擁兵恫嚇。彼時民智未開，尚不知民國為何物，革命軍士氣雖旺而未經正規的訓練，民國幼芽經不起風暴的吹動。先生有鑒於斯，又恐袁世凱挾清廷自重而不改國號，為免於中華民國的天折，願與袁世凱和談，讓出總統寶座。先生以仁者之心待袁，詎知袁於攫取總統之後，置先生願望不顧，變本加厲的推行獨裁和帝制，迫不得已與師討袁。從這段事實看來，先生要和平奮鬥救中國，不願內戰造成國家元氣的損傷。更值得後世師表者，先生不惜一切犧牲，置個人權位於度外，旨在保持中華民國國號，徐圖建設新國家。當前毛匪澤東廢除中華民國國號，我們要效法先生的精神起來奮鬥，不爭個人權位，不鬧私人意氣，各就崗位努力，求新上進；先謀中華民國的現有基地團結一致，以國家為全民活動的園地。不仇視，不排擠，和諧協

力；造成國事人人有責和個個有分的普遍意識和現象。待到時機成熟，一舉便可光復大陸，鞏固中山先生所首創的中華民國的國號，與領土的完整。惟其如此，始能符合先生創建民國的初衷和精神。

「知識不自經驗生」，「知識乃自經驗出」，不論是先驗的或經驗的，須經得起行為的實證。否則知識與行為脫節，無補於人類的生活。是故求知識或求常識，不是那般簡單的事。我國進入農業社會較早，加上天人合一的觀念，養成了一種保守、模倣、神秘的習性。殷高宗時傳說提出「知之匪艱，行之維艱」口號，竟被腐儒誤解，造成了知識為獨特階層所享有，乃至視踐行是一種分外之事。因此，文化和政事居於僵凍狀態，而很少有創新的現象。明季王陽明欲振時弊，提出「知行合一」的理論，終敵不過三家村集團的阻力。其上乘者，也只是在「平居袖手談心性」，遇到國家有難，便束手無策，充其量是「臨事一死報君王」。誤國誤民，造成民族力的衰落。中山先生從根源處診斷出病情，要從心理建設着手，提出「行之匪艱，知之維艱」的理論，在我國民心疲廢的時候，注射了一針強心劑。現在要掘發民族活力，使她呈現一種朝氣，必須重「行」，從「動」中的經驗，歸納出合理合用的原則，而將「暮氣病」予以根除。人類行為本應合乎理性，以理性克制感情用事，這原是鵠的。但，人究竟是動物，行為中十分之七八是受動物性支配，換句話說，就是錯的行為要比對的行為來得多。所以一個國家須有思想家教育家居於啓示地位，使衝動性行為減少錯誤的程度。回顧人類史實中，治世的時間短，亂世的時間長，便是理性與動物性的消長作用的後果。一個老大的民族，積習過深，若望其回復青春時代，就要祛除多所畏忌的心理，而能針對現實，解決問題，敏

捷行動，爭取時機，加速的提拔下一代，承擔重任。在現階段下，我們應遵照中山先生的「行之匪艱」理論做去，激勸大家求新，從行中獲取經驗，進而求證於理性，俟活力養成，思維力也就發達，而知識與經驗的交互運用，便有適度的準則了。

先生手訂建國階段為軍政時期，訓政時期，憲政時期。軍政訓政兩個時期，可以說是達到憲政時期的權宜手段。而憲政時期，便要照先生的和平奮鬥救中國的指示，使人民與政黨，能夠自由活動。目前人民的智識程度不高，公民教育和經濟生活尚不夠水準，驟然解放，又將造成民主災禍或暴民政治。只有鼓勵政黨和各種社團，作示範和溝通民間的自由活動。先養成國家高於個人或團體的觀念，服從法律的習慣，培養人格的尊嚴，和敬事守分的意識。同時，開放學人和青年的思想言論自由，其行為只要不違反「顛覆國家」，破壞「動員戡亂體制」，和傷害「善良風俗流向」的三原則，可酌量任其自由發展，而茁發出「獨立性」，「創造性」，「責任性」的心理上人格。使違反人性良知和民主法治的邪惡言行，無法乘隙侵入作祟。蔣總統曾再三強調過，現行憲法是我們反攻大陸的武器。又說：今後對共產黨的作戰，要從思想戰和文化戰着手。任何強權，敵不過思想和文化的潛能所發生的力量。這是一個鐵則，端賴現行憲法逐步實施，才能發生作用。

現代國家的立國要訣，為內求堅實，外求溝通。我國政治家洞悉這個道理者，頗不乏人。然有遠識並見諸行為者，首推中山先生。清末鼓吹革命，不斷奔走海外，即在爭取海外的同情和連絡各國的關係。與夫我國幅員廣濶，北有蘇聯，東有日本，猶普魯士之有俄法兩大強鄰。所以對蘇日兩國關係，如不能溝通融洽，便有心腹之禍。先生自發動革命以後，即與日本朝野交往；蘇聯革命成功，派遣留學生並信使往還甚密。民國十三年，乃分內之事。而共產黨不循普通政黨常規活動，蓄意滲透，武力顛覆，固為先生始料所不及，即英美先進國家亦常受其惑。其達反政治道德而能稱霸於短暫時際的投機和幸運，也可以說是舊社會或民主社會的原有病態所招致。我們在消除亞洲和平的禍根朱匪幫之後，要致力於國家建設與

世界和平，仍須要照先生之初意，重行厘訂方針，加強日蘇問題的研究，多派學人出國考察，並從文化和商業據點，與彼邦朝野交遊，這才是為國家作遠程打算的策略。復念百餘年來，對於鄰國外交沒有辦好的原因，人才的缺乏或使節不稱其才，為一重要因素。要彌縫過去的疏忽和錯誤，應多訓練和儲備專才。否則不能知己知彼，對外關係變成表面上的交際，不能發生外交上的作用，甚望當局有以注意，並作長遠的籌劃。

今之言救國者，捨民主憲政，別無他圖。欲達此目的，則唯有循「和平奮鬥」途徑，方為上策。試觀先生的上李鴻章書，南北和談，孫梁合作，孫段張合作，和聯絡日蘇事蹟，無不以和平為出發點。至於間有興兵舉動，勢所使然，並非本旨，也可謂行道時的一種方術。倘先生晚死一二十年，日蘇野心或不致遽有行動，國家得有喘息機會。政治清明，則外人亦不敢來犯。是故先生之生卒，影響國家的興衰莫大。然多難興邦，歷經創痛所得的寶貴教訓，也極豐富。乘此反省，急起直追，本先生之精神和最高原則，平實以進，庶為未晚。那才是名符其實的推崇先生為中華民國的國父也！

最新機器

承印書籍

彩色印刷

證券商標

新文化彩色印書館

館址：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
電話：三三九七五七